



曲鹏飞

现代国际关系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兴起，其根基是西方的政治文化。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西方政治文化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给近现代国际关系烙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虽然西方国家也在国际关系中倡导所谓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但强权政治和大国争霸始终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主要脉络和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新型国际关系。自成为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新型国际关系。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国际战略。按照当时的预期，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的高潮会伴随中国革命的成功加速到来，党必须对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政权贡献力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试图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在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全面合作和互助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之上。毛泽东指出：“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

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毛泽东曾把中苏关系看作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型，认为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真诚援助“向全世界显示了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们党话语体系中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认同和实践的一系列国际行为范式，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援助的共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立场，捍卫本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要求等。

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进入50年代，在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中国共产党逐渐加深了对广大新兴民族国家的认识。1954年，中国同印度、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兴民族国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思想。至1956年，毛泽东已将中国外交政策明确地表述为“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周边环境严重恶化，中国对安全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安全形势的基本评估是认为中国正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世界大战具有可能性和紧迫性。构建反对“帝、修、反”的“国际统一战线”开始成为中国国际战略

的主线。基于此，我们党所设想和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内涵已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展为在同“帝、修、反”斗争过程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应的，“新型国际关系”开始用来表述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196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刘少奇出访的报道中，首次把中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称之为“新型国际关系”良好的范例，并指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于中国同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发展民族经济，进行和平建设。中国和亚非国家有一切理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进行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外交机构官员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各国完全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问题、确保每个国家都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确保每个民族都有权参与解决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时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霸权阴谋和政策。

20世纪7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建设

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总结1949年以来30年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对国际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其核心是彻底放弃“一条线”和“大三角”为中心的国际战略，坚定地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开展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外交。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上，赋予了“新型国际关系”更鲜明的时代特点。邓小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突出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原则，即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压力，也不同意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二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即奉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坚持原则，伸张正义，不拿原则作交易。三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江泽民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完整系统地阐释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框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4个方面的内容，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 and 以武

力相威胁”。江泽民把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4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构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等4个方面。“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对构建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构建“和谐世界”思想从全球层面阐明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繁荣稳定同各国共同繁荣的有机联系，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和谐世界思想反映了21世纪初全球性问题增多带给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作为一个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将国内政治经济建设同世界发展和时代潮流相适应，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入第四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审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交思想，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

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共路同径体

张文涛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年来，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普遍现实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应当看到，这种理念与普罗大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如何在更广范围内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之成为普通人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中的有机成分，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课题。从知识角度推进对于宇宙演化历程、物种进化过程和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并将之推广普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言，“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按照最近的科学认知，宇宙有1382亿年的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时空尺度或许过于宏大。然而太阳系中的威胁却不时存在。小行星和彗星。距今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天体撞击地球，在墨西哥湾形成了巨大的陨石坑，释放出相当于100万颗氢弹的能量。一些研究者认为，正是这次撞击事件导致了恐龙的彻底灭绝。1908年，由于彗星撞击引起的通古斯大爆炸，瞬间将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化为灰烬。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马丁·里斯教授在《终极时刻》一书中说，面对行星与彗星引发的巨大天灾，人类目前尚无有效应对之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放弃了对于风险的研究和防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德·宾泽尔发明了可衡量天体撞击严重程度的杜林危险指数表。近地天体撞击研究专家据此修订出更为精确的巴勒莫指数。克洛坎斯基、格雷格·劳克林等科学家倡导并正从事着试图改变天体轨道的“太空工程学”研究。电影《流浪地球》所引发的空前观影热潮，正说明潜藏在大众内心深处的不安与渴望。

当然，宇宙并不仅仅意味着风

险，同时也是人类福祉的希望所在。两大主题已经成为人们时常讨论的对象：一是对于宇宙能量的利用。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了著名的卡尔达肖夫指数。根据人类对于宇宙能量的利用程度，他区分出I/II/III型文明。I型文明属行星文明，II型文明属恒星文明，III型文明属银河系文明。按照这种理解，当前人类对于能量的利用并不充分，尚未达到行星文明标准。诸如弗里曼·戴森这样的物理学家，已经沿此思路，探索人类文明升级的可能性方法。二是太空移民的可能性。科学家卡尔·萨根对于改造火星的不懈梦想，激发了许多科学家的热情。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领衔的火星探测计划，也吸引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参与其中。以实现移民火星梦想为己任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已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式人物。

自伽利略、牛顿以来，近代科学对于宇宙的探索，已经取得可喜成就。尽管如此，目前的科学认知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诸如宇宙起源、平行宇宙、暗物质、暗能量、外星生命、黑洞等众所关心的问题，人类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地球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恐怕仍旧是人类唯一一家园。宇宙承载着人类的最终忧虑与希望，宇宙学也是培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们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知识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还提到：“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里提到的“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文化现象的人类，更为基本的是作为生物现象的人类。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现代生物学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自达尔文以来，人们在探索物种进化过程领域取得的进展，已经超越以往一切时代。我们知道：约

在40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现象；约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物种类突然丰富起来，呈爆炸式的增加，史称“生命大爆发”；约在32亿年前，最早的爬行动物出现；约在6500万年前，出现灵长类动物；约在20万年前，现今所有人类的共同祖先智人出现。倘若以幸存者眼光来看，无论是细菌还是人类，现存的每个物种都有着史诗般的进化过程。

然而这种史诗般进化过程的背后，也有着更大数量物种不断灭绝的悲凉故事。自寒武纪以来，地球物种经历了五次大的灭绝事件。诸如星体撞击、宇宙射线变强、火山喷发、气候变化、海洋盐度变化、地磁变化等，都可能是造成物种大规模灭绝的原因。如果其他物种的灭绝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那么不妨看看我们智人的近亲。按照人类古天文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的看法，200万年前，至少有六支类人物种生活在非洲。而如今，只有我们这一支得以幸存。脑容量与现代人相当的尼安德特人，约在3万年前消失。约在1.3万年前，弗洛里斯人退出进化舞台。

我们是该庆幸成为唯一的人类幸存者，还是该担忧如尼安德特人般的遭遇也会在某一天落到自己头上？无论哪一方面，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于进化过程的认识。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克里斯·斯特林格等人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既没有方向，也不可不知，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如果这种认识没有问题，那么詹姆斯·勒夫洛克和林恩·马古利斯等学者倡导的“盖亚学说”，就值得重视。这种学说认为，生物圈是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完整生命系统。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的生物圈2号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说明我们对于生物圈的认识仍然不足。介于这个巨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要重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价值，学会以协同演化的眼光看待整个系统，以防止某些物种的灭绝引发蝴蝶效应。毫无疑问，增进对于地球物种进化过程的认识，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知识路径。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一段经典论述：“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所概括的现象，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分散到整体的历程。近几十年来，得益于遗传学与史前考古学等学科的贡献，人们对于人类发展进程有了新的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智人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繁衍的过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智人约于12万年前从非洲迁徙到中东，5万年前乘船抵达澳大利亚，45万年前抵达欧洲，4万年前到达中国，3万年前抵达斯里兰卡，约2万年前到达日本。大量关于人类线粒体和Y染色体的研究工作，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今天地球存在的所有人口，尽管存在许多方面的差异，却有着共同的祖先。

由于环境影响和人们自身努力的差异，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肤色、种族、民族、语言、信仰、习俗等形形色色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成为人类从分散到整体过程中的强大阻力。部落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较量、宗教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夺充斥着各个角落。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之后的核竞争，几近将人类带入灭顶之灾。也正是鉴于这样的现实，承载着人类维护和平理想的联合国于战后成立。爱因斯坦与哲学家罗素等人倡导的“帕格沃什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传播和平理念的积极作用。如今，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各类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忽视的强大推动力量。

或许囿于专业知识的隔膜，科学对于文明进程的塑造作用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有鉴于此，已

关系的基本理念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三大理念着眼人类共同发展，构建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走上一条共同繁荣与发展之路。在布局上，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立足于自身，加强同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等三类国家及多边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带动示范作用。在实践上，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要依托四个“抓手”。通过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将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推广到全球，为国际关系的演进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与沿线各国共同打破发展瓶颈。“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愿与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提供了宝贵舞台。通过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为解决当今全球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促进包容性发展，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使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纵观新中国70年外交风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与实践深受当时的国际格局和国际战略影响，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外交政策，不断扩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但同时也保持着稳定的主线，即在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宗旨。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有效应对各类全球性危机与挑战，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和衷共济、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故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萨顿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认为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人类发展的历史，无疑能佐证这种看法。当然，科技批判思想也需要引起重视。正如一些科学家与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是一项风险累积的事业。越尖端科学技术，越可能带来更高的风险。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都曾带来巨大灾难。阿道斯·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与电影《终结者》等所描绘的托邦，是一个可能出现的世界。

近几十年来，遗传学与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使得后人类新物种的出现具有了潜在可能性。遗传学领域中，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2000年，英美联合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基因组草图已经完成。近几年的基因编辑技术，则为定制人提供了可行性。人工智能领域中，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开创了人工智能时代。2017年，阿尔法狗在人机对弈中取得全胜纪录，说明人工智能在局部领域的能力已经将人类甩在身后。无论是基因技术等导致“人的机器化”，还是人工智能等导致“机器的入化”，或者是人机交互导致的“赛博格”，都将意味着物种进化史上的新纪元。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类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文明发展进程既给人类全体带来巨大收益，同时也给所有人带来日渐增大的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进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是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有效知识路径。

